

木鱼石书局

● 生活掠影

秦汉生活掠影

A Glimpse of Life in Qin Han Dynasties

王凯旋 编著



沈阳出版社

秦汉生活掠影

A Glimpse of Life in Qin Han Dynasties

王凯旋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秦汉生活掠影/王凯旋编著.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02. 2
ISBN 7-5441-1836-3

I. 秦… II. 王… III. 社会生活—中国—秦汉时代
IV. D69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09925 号

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110011)
沈阳市第二市政建设工程公司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200 千字 印张: 10
印数: 1-5000 册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赵敏 禾森 责任校对: 刘捷
封面设计: 君华 版式设计: 张建荣
责任监印: 杨旭

定价: 17.80 元
(如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前 言

秦汉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辉煌时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期和成熟期。秦汉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几乎全部内容都贯穿于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的发展之中并深刻地影响着二千余年的中国文化。反映这样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的多层面、多人物和多领域，是真实了解和全面学习秦汉历史的必然要求。

若干年前，秦汉史曾作为我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方向；若干年后的今天，在攻读明清史博士学位的同时，仍喜读秦汉文献，这大约也算是我的治学情结。翻阅明清时代的笔记文献，使我油然回想到秦汉时代的许多私家文献上，尤其是近年来隋唐以下各代涉猎社会生活的通俗学术读物不断出版问世，宛若向人们敞开了扇生动鲜活的社会历史生活的大门，这是学术走向民间的极好尝试。这些著述言之有据而不乏文采，论列广泛而不乏严密。拜读这些海内外学人的著作，不能不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这也就是我不揣浅陋，贸然执笔该书的真情所在。

本书所涉及的题目包括秦汉时代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各阶层人士的日常生活，反映秦汉时代的有关民俗民风等亦在此中。基本上是单独成篇、不相连属。所谓掠影，也正是说明了它还不是一部完整的秦汉社会生活史，仅只可以

作为笔者对秦汉社会生活的浮光随笔。

由于秦汉时代的文献资料所限，给笔者的材料搜集工作带来了不少的困难。所幸的是有诸位先贤学者的论著或成果可资利用，才使我的写作得以比较顺利的进行。书中多处参考并大量引用了许多专家的成果，如林剑鸣等先生所著《秦汉社会文明》、孙机先生所著《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杨树达先生所著《汉代婚丧礼俗考》、乔伟先生所著《秦汉律研究》、熊铁基先生所著《汉唐文化史》、余华青先生所著《中国宦官制度史》、完颜绍元先生所著《流氓的变迁》等。鉴于该书系面向大众读者的通俗学术读物，故从全书体例和相关条目的写作要求出发，没有一一列举所引成果。

书中的图片资料主要来源于孙机先生的《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一书和刘志远先生的《四川汉代画像砖和汉代社会》、翦伯赞先生的《秦汉史》、查瑞珍先生的《战国秦汉考古》等书。在此基础上，也有许多内容是我多年来思考和研究的一些问题。有些还很不成熟，算是研学秦汉史的一点心得。这本以杂谈形式为基调的书稿是笔者试图向大众读者做一些秦汉史、特别是秦汉社会生活史学术普及工作的一项粗浅的尝试。故此，疏漏与缺失一定不少。

“天道酬勤”，对秦汉史的学习也是如此。我自视学力不深，惟愿以勤补拙，如果这本零散而就的小书能够让读者朋友们对秦汉历史唤起更浓厚的兴趣，即使回过头来批判有加，也仍是值得去做的。在学术的道路上，只有争鸣的诤友，愿读者诸君赐教，言祈心诚。

目 录

前言	1
秦汉的士风	1
秦汉宦官面面观	14
秦汉的刑法与刑徒	21
秦汉惩治官吏的法律	34
秦汉时代的城市	46
秦汉的交通	60
秦汉的交通工具	73
汉代酷吏琐谈	86
汉代的官商	95
汉代谣谚与世风	103
汉代的流氓	117
汉代的市井生活	124
汉代货币与汉代社会	133
汉代的胎儿教育	145
汉代人的审美观	150
汉代的文具品	157
汉代娱乐生活	168

汉代婚俗浏览	178
汉代丧葬习俗	190
汉代饮食漫话	201
汉代人与酒	213
汉代杂技见闻	221
汉代家具与家庭装饰	229
汉代的住宅	239
汉代的养马和相马	249
汉代的婚姻法	256
汉代女子的梳妆和化妆品	264
汉代服饰几何	271
汉代地图概说	280
汉代的医药和医学	285
汉代的灯具	291
汉代的日用杂品	298
汉代的制盐业	304

秦汉的士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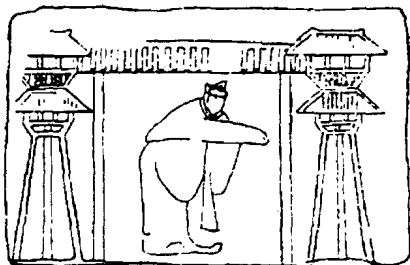
士人，即通常所说的读书人，是秦汉时代一个相对而言比较特殊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的人员素质相对较高，文化底蕴也比较深厚，对社会生活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所出现的问题既关注又十分敏锐，并在社会上以立言立说阐述和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主张。秦汉间的这一批士子文人在他们自己的精神领域和内心世界里极富个性化，他们或在朝，或在野；或讲学游宦，或落拓不羁。他们的言行和思想意识对秦汉两代的政风、民风都有深刻的影响，秦汉士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创新者。

秦汉时代的这一批读书人在个人性格特征、情感思维、身世经历、道德追求、生活理念、待人处事以及所持学术观点、为政信仰上都存在很大的差异，但士人忧国忧民的心理特征则是普遍共有的。秦汉士人很少将自己锁定在书斋文札中，他们把自己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和诗文著述看做是社会的学术和政治的学术，因而在秦汉流传下来的许多文献里很少如宋儒那样嗜谈性理的言辞，即便像《史记·天官书》那样的纯天文学著作也无不涉及社会政治的内容。因此秦汉士人讽议朝政，裁量人物，评说世事，纳言献策。其学术目的之明确，论世事之尖锐，参与政治之热情为中国历代所少见。正因为如此，士风在秦汉两代的影响也就非常广泛而深刻。

一、秦代的士风

秦代是中国统一专制王朝的开始，从秦代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是皇帝家天下的时代。皇帝一人说了算，政权专制垄断了一切，士人在其间的作用是以维系专制皇权的需要来衡量的。

秦政权用五德终始说中的水德作为立政的根本，水德主刑杀，因此崇尚先秦以来的法家思想，以严刑峻法贯彻其政治统治，所以士人中学法家一派的李斯便得到了秦始皇的欣赏。当然李斯主张法家治



秦汉士人图

秦也并不是秦朝建立以后的事，在战国时代的秦国时期就已经如此，李斯也因此由士学之路踏上了仕宦之途。李斯在秦统一后曾做了对中国历史来说是大大的一件好事，这就是他同群臣的辩难中坚持实行郡县制，反对分裂割据的分封制，并为此后实行的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等项措施出了力、立了功。但他为维护皇权，抑或说他慑于皇权的淫威，由一个读书人回过头来残灭文化，尽焚诸子百家之书，最终也没能逃脱专制王朝政治斗争殉葬品的命运，并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在秦末的政治角逐中，李斯为谋求一己之利并保全政治荣耀，俯首低眉于邪恶的宦寺赵高。但最终还是赵高要了他的命，这是作为丞相李斯的悲哀，更是作为士人李斯的悲哀，一个软骨士人应有的悲哀。

秦代有相当一些知识分子为求生存之路和显达地位而屈身于皇权门下，对皇权的代表者皇帝本人极尽谄媚阿谀之能事。秦代建立不久，就有几十名博士联手像啦啦队一样在宫中大颂秦始皇的“功德”，其过谀之甚，读者一阅便知。他们明知在助纣为虐，却不愿人们把它说出来，政治士人的心态之诡、情感之复杂正是秦代士风一个方面的反映。

虽然如此，但是秦代的读书人并不尽如李斯的为人，秦代的知识分子中有许多人不愿或拒绝为当朝出力。他们隐姓埋名，寄居乡野，游学论世，诗文言志。一个客观的结果就是尽量不使自己的踪迹被秦政权的鹰犬们发觉，三世相韩的张良即是这样的士人。秦代的这一批智士学人并非不想参与政治，但“良鸟择木而栖”的理念以及能够代表和反映他们学说意愿的政治领袖的出现却



秦之罾刻石

是决定他们是否出仕的前提条件。秦代的两届皇帝都不是这样的人选，因此秦代士风中一个最突出的现象就是知识分子的沉寂。在中国古代各朝历史中，大批士人远离政府而退隐于民间，秦代大概也是绝无仅有的一例。在朝任职的博士官们也只是充作政权装饰的门面以及备作皇帝典章文赋的顾问，如此而已。从今天所能见到的有关秦代的各类文献中，都很少可见士人的身影。秦代的士人在民间，秦代士风的源头也在民间。秦

代专制独裁的政治统治，使得许多身怀硕学的士人远离秦政权而深藏于民间或乡野。“士为知己者死”曾是先秦士人的一条名训，但这样的名训在秦代的政权中却再也难见。

秦代知识分子中也有人视暴政为仇敌，前面所说三世相韩的张良就曾计划在秦始皇出巡的路上截击“椎杀之”；秦皇帝东巡即遇“始皇帝死而地分”的刻书；甚至也有人以求长生之名套走了秦始皇的大批钱财，尔后又对秦皇帝大骂一通扬长而去；更有众多的士人公开或私下里以言谈文章等形式反对秦政权的残虐无道。秦始皇为此而恼羞成怒，《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说：

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阬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这犯禁的四百六十多人正是秦朝的文人学士。为什么非要致这些士人于死地不可呢？因为这些士人攻击政府，攻击专制残暴。杀这些人是给更多的士人一个信号，同时也是一个警告——即皇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由此可见，秦代士风中反专制残暴的色彩十分浓烈。即便在“焚书坑儒”以后极其恐怖的时代，士人也仍然没有停止这种反抗斗争，所以秦代的先后两位皇帝对士人十分痛恨。学术历来是师承授业，秦政权否定了弟子求学于士人的客观法则，强制学子们“以吏为师”，用一种强盗的逻辑替代学术的规律，其政治的荒谬愚蠢达于极点。它突出反映了秦专制政权对士人士学的恐惧。汉代的学者伏生当年曾在家中墙壁内藏有被禁毁的《尚书》，说明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还是敢于冒杀头的风险来保存文化火种的。而且像伏生一类的士人，当也不在少数，否则就无法解释当西汉惠帝“除挟书律”后，会有那么多的先秦文化典籍能够在民间重现这样一个事实。

秦代士人在等待时机，这样的时机终于来到了，这就是以陈胜、吴广为代表的反秦大起义。值得注意的是，秦末各路反秦义军中，都有为数不少的士人出现，这种一夜之间士人突现的情况并不是偶然的，内中深刻的原因是不言自明的。士人慕名投军，参佐军务，枢办行政，积极地为新政权出谋划策，摇旗呐喊，其重要意义就在于士人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特别是作为一个智士集团，已成为覆亡秦政权的一支重要力量。虽然这些士人中有许多是来自于六国旧贵族的后裔，每个人的主观动机和所要达到的目的各有不同，但士人与反秦义军的携手，却无疑是建立在推翻暴政的共同基础之上。秦在立国后曾力克山东六国，其时士人云集，游说东方，张仪、范雎之属皆为秦所用，势力之大，锋芒之锐，无人无国可挡。但在秦朝建立的十五年后就急衰直下，表明秦政权昔日的活力已不再现。司马迁总结秦朝败亡时说：

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政权失去了人心，也失去了作为政权建设基柱的知识分子的支持。

秦代士风在秦代的腥风血雨中始终昂扬着正义和进取的雄姿。它不同于商业时代的文人群体，中国传统的儒家风范和人格理念是秦代大多数士人的最高追求目标，名利观念也由此而被大部分读书人视为浮云。这种文化精神和价值的存在就决定了秦代士风的社会走向。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篇中说：

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兼并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

反抗暴政是秦代士风始终唱响的一个主旋律，由此而深刻地影响了秦代的政风和世风。摧残文化、摧辱士人的统治者从来不可能坐久天下，秦代存亡的事实足以成为历史的鉴戒和写照。正如司马迁所说：

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钳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史记·秦始皇本纪》）

二、汉代的士风

汉代，实际包括了西汉和东汉两个王朝阶段。从整个汉代历史来考察，士风的变化和表现呈现出巨大和多样的特点。与秦代不同的是，士人在汉代参与政治的热情比较高，分属于各学派的士人利用不同的场合和渠道表达自己的学术见解和对社会时事的关心。伴随两汉外戚、宦官、党人、太学生等一系列的政治斗争，士人群体也充分地参与其间，在社会政风、民风、世风等许多方面都处处表征着汉代士风的影响。士风也在社会的大背景下发生着深刻而微妙的变化。汉代士风的政治民主色彩也愈显浓重，对汉末政治腐败的抨击表明汉代的士人阶层忧患意识的强烈。汉代士人的忠君思想比较浓厚，它成为汉代士风维护皇权的一个很重的砝码。随着汉代社会商业意识的高涨，汉代士风的吹拂也散发出商业市场的气息。因此就汉代的士人和士风而言就体现为一种具有时代和社会变化的精神意识。

汉代士人参与政治的活动贯穿了汉代存亡的始终。汉代的皇帝比起秦代的皇帝来也比较尊重当世的士人。刘邦原为一介村夫，但他在建立汉帝国后，还是懂得知识分子在政权建设上的作用的，所以他启用学人叔孙通来制定礼法，汉高祖对士人的礼遇固然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但在客观上却为士人参与政治活动开了方便之门。在西汉初年的中央政权里，士人的比例明显的高于秦朝，如张良、陈平、陆贾、贾谊、酈食其等人都是饱学之士。西汉初年的许多大政方针的制定都离不开士人的积极和努力。刘邦之后的惠帝颁布“除挟书之律”，事实上等于否定了秦代的焚书之举。文、景两皇帝和西汉武帝也在尊礼士人的同时，进一步开放了学术空间，儒、道、墨、法各家学说又相继兴起。但在汉代，基本的学术倾向还是儒道并行，虽然武帝时“独尊儒术”，但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强力限制各派学术的自由发展，更没有采取极端的恐怖手段。立于政府学官的儒学是汉代所倡导的“国学”，没有立于学官的各家私学还是可以作为一种文化学术保留并传播的。所以汉代士人中的私人讲学之风很盛，门徒弟子也很多，特别在汉代地方藩王和豪强地主接纳士人充当谋臣的社会政治背景下，私学的发展实际是很快的。《西京杂记》记载说：

河间王德筑日华宫，置客馆二十余区，以待学士。自奉养不逾宾客。

河间王礼贤士人，他对自己的要求是生活标准不能超过宾客士人。可见汉代已大有战国时代的养士之风，由此使士人为报知遇之恩而投身政治和社会活动，汉代的士人也就不再沉寂了。

汉代前七十年的历史中，官私之学都比较活跃，它比较秦代“以吏为师”的法家一学，其学术氛围自然相去甚远。在这

样的社会大背景下，西汉前期的士风就表现为积极进取的学术意识和士人参政议政的主动精神。从西汉的相关史料考察，汉代士风的这一特点基本是一以贯之的。

西汉初年相继出现了一批杰出的知识分子代表，如长沙王太傅贾谊，如太史令司马迁，如博士官董仲舒等。他们针砭时政，言辞尖锐，对汉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问题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论阐述。汉代的政治环境对学术的发展比较有利，除东汉后期宦官干政，排斥异己、剿杀士人外，各代皇帝从总的看，对学术、学派的活动并不横加阻挠。故此，两汉时期学人辈出，如刘向刘歆父子、张衡、司马相如、东方朔、匡衡、贡禹、蔡邕蔡文姬父女等。《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了东汉一朝著名的儒林学士就达二十四人，这也是仅就充任政府学官的人来说的。大量的在野或于民间游学之人以及后学传习者尚不在列传之中。这样众多学人的出现是汉代文化繁荣的基石和保证。

西汉时期的学人大多具有为民请命的精神意识，在有关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等关系汉代民人经济政策的制定、商讨、确立和实施的各个不同阶段，汉代学人都以高度的忧患意识上书直言，痛陈时弊，使这一时期的基本政策大致保持在比较有利于民的水平上。这一时期的士风也呈现出比较健康向上的势头。在西汉年间反对地方封国割据，揭露酷吏贪残虐民之事以及豪强地主侵吞民人土地和官吏违法揽赃等许多方面，汉代士人中的许多人都直言敢谏，表现和代表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优秀的气节观和正义品质。

汉代宽松的学术环境使这一时期的士风呈现出各派各家学说纷呈的特点。西汉初年，代表道家一派的黄老学兴起，这一时期的社会思潮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清静无为的治政方针。汉

代学术的恢复大约也是从这时开始步入一个相对平和的时期。士人此时的言论明显增多，其个性化也比较突出。如贾谊的《过秦论》、《治安策》，晁错的《论积贮疏》等，其锋芒直指朝政流弊。两人的结局似乎都不大好，但这不是汉初士风的命运所在，而是其中深刻的政治原因所致。就单纯的学术问题而言，汉朝政府并不强制树一派而压一派。汉代文献中屡屡出现的官吏士人上书言事和谏诤抗命之辞的多次出现，说明汉代还是一个允许士人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相对自由发展的比较好的时代。像东汉末年的黄巾领袖张角最初组织太平道，汉政府并



秦汉士人图

没有太多的放在心上。直到张角公开打出反抗东汉政府的旗帜以后，才引起了当权者的恐慌和镇压。当然，张角和汉政府的对立不是学术观点和学术争论的问题，而是农民革命要推翻地主阶级专制腐朽政权的问题。这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我们所要说的是在汉代皇权政治的社会条件下，形成汉代士风的那些客观存在的因素和条件。正是汉代社会在总的历史背景下的这种氛围和条件，使汉代士风从一开始就展示出许多不同于前代的独有特点和理念倾向。

汉代士人在生活理念上恪守并坚持奉行着知识分子应有的气节。《孟子》一书在阐述儒家理想的道德人格时说，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汉代士人以此为宗旨，他们的气节观和行为规范都体现为一种平实求真、豁达人生、绘画千年并与自然一体的完美境界。这是汉代士人最高的人生追求，也是汉代士人立足于世的精神支柱。汉代士人对气

节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又不是抽象虚幻的，而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随时都可以触及到的真实精神，这就是对正义、信念、道德、情操、自尊、自重、自强、自爱、刚毅、果敢等精神品质的物质再现。

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序》中说：

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

不独汉代的侠义之士如此，文人学士亦如此。贾谊在西汉初年三上《治安策》，不避刘氏宗亲的诸多忌恨，是冒了极大政治风险的。因为对封国和刘氏宗亲的任何一点攻击性言论，都可被视为是对刘姓王朝的攻击，是离间皇权血缘骨肉的行为了，是要遭重谴或杀头的。他的直言极谏使他远离了京师，也使他从此落落寡欢于众人之外。但贾谊的内心并不曾软弱，他是忧郁而死，但他独立的人格精神并没有死。汉代士人在政途上的不得志并没有磨蚀掉他们内心气节的一丝一毫。西汉前中期士风中的主流也是如此。

西汉武帝以后，由于谶纬神学的兴起，士风中出现了一些消极的东西，一些士人为求得自己的仕进之路，迎合阿谀当权者的神权心理。《汉书·王莽传》记载说：

梓潼人哀章学问长安，素无行，好为大言。见莽居摄，即作铜匱，为两检，署其一曰“天帝行玺金匱图”，其一署曰“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某者，高皇帝名也。书言王莽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图书皆书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兴、王盛，章因自窜姓名，凡为十一人，皆署官爵，为辅佐。

像哀章这样的学问者，无非是为求取王莽的欢心，以便在日后的从政生涯中捞个一官半职，其猥琐的心态一望便知。到东汉时期，汉光武帝极力张扬图谶。汉代政府对治学的宗旨也